



教育评论

推动教育督导「长牙齿」 打造教育治理新格局

□ 平 辉

与管理、保障机制等方面作出全面系统的制度安排，并在每个改革环节都提出了很多具有时代性、创新性和引领性的改革举措。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当前我国教育督导面临的瓶颈问题和突出矛盾，首次系统构建了新时代教育督导完整制度框架，明晰了改革路径和任务分工，引领国家层面教育督导改革扎实推进，为地方深化教育督导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具体指导。

三个特征

《意见》紧紧围绕确保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瞄准当前我国教育督导存在的机构不健全、权威性不够、结果运用不充分等瓶颈问题，构建了全面系统的新时代教育督导制度框架，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特征。

一是制度设计系统完备。《意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导体制机制的改革目标，聚焦优化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强化结果运用三个突破口，从改革目标、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问责机制、队伍建设、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开展系统的顶层设计，集中强化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职能框架，整体上涵盖了当前教育督导工作的每个环节，切实为国家和地方推进教育督导改革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制度供给。

二是制度安排创新高效。《意见》在具体制度安排方面部署了诸多令广大教育督导工作者感到耳目一新的创新高效改革举措，为当前教育督导实践中面临的许多突出困难提供了改革策略和解决方案。比如，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机构设置方面，新增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成员单位，强化了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人员配备及沟通联络机制，充实了教育督导力量，增强了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威性；在运行机制方面，明确了督政、督学和评估监测的工作重点，进一步规范了教育督导职能体系的核心内容，帮助教育督导工作者准确把握各项工作的具体着力点，推动各项教育督导工作稳步有序实施。

三是关键举措精准有力。为破解长期影响教育督导专业性和权威性的“督导结果运用不充分”问题，《意见》准确抓住了“深化问责机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打出了规范和完善报告制度、反馈制度、整改制度、复查制度、激励制度、约谈制度、通报制度和问责制度的全新“组合拳”，细化了工作分工、流程及要求，有效填补了教育督导问责制度的空白，实现教育督导问责制度的环环相扣、稳扎稳打，全面拓展教育督导结果运用范围，大大增强教育督导的权威性，真正助力教育督导“长牙齿”。

三方面工作

《意见》还为地方推进教育督导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根本遵循。如何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实落地，上海市具体抓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以独立行使法定职能为核心，优化督导管理体制。健全市区两级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设置，对标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最新组成单位，增加新的成员单位，建立规范的工作流程和沟通联络机制，充分发挥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作用。全面落实教育督导机构的法定职能，协同推进督政、督学和评估监测工作，加强对区级教育督导机构的指导和管理，努力确保教育督导机构独立行使职能。

二是以健全法定职能体系为重点，完善督导运行机制。全面梳理和系统更新本市教育局政策、标准及规程，打造符合国家最新政策要求、满足工作实际需要的教育督导职能体系。在继续稳步推进督政、督学工作基础上，聚焦教育质量提升，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监测、评估体系，引导督促各级各类学校遵守教育规律、提高教育质量，不断提升本地教育现代化水平。

三是以落实问责制度为抓手，强化督导结果运用。进一步推动教育督导结果的充分运用，以《意见》为制度依据，以贯彻落实问责机制改革为突破口，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方式和方法，综合施策，将督导结果充分运用于政策支持、资源配置、干部考核奖惩等方面，推动教育督导“长牙齿”，提高督导权威性、实效性。

（作者系上海市教委总督导）



《老子》的爱民之道

□ 张鑫华

诞生于二千多年前的中华优秀传统典籍——《老子》，全书仅五千余字，包罗万象，语精义深，被后世誉为“万经之王”。鲁迅先生曾说：“不读《老子》一书，不知中国文化。”

以百姓心为心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是老子的政治观，要求执政者不要有常人的私心，而以百姓之心为心，并在这一章里提出“德善”“德信”的观点，强调以善心、诚心对待所有人，以不分彼此之心去治理天下。老子提出这个观点，蕴含深刻的人生智慧，体现对社会规律透彻的洞见，具有鲜明的人本思想。春秋时期，诸侯们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争夺更多的土地和人口，频频发动战争。这些战争造成社会动荡、土地荒芜，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和巨大牺牲。面对这一段刀光剑影的历史，孟子痛下断言：“春秋无义战。”身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在遍阅古今史料，总结前王朝和春秋诸侯国治乱兴衰的规律后，提出了“以百姓心为心”的光辉思想，对执政者给出了以民为本治理天下的方法。

自有人类以来，劳动人民从事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是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从本质上讲，劳动人民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因此，评价一切历史活动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古往今来，历代王朝更迭兴衰，无不取决于民心向背。统治者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压迫，繁重的苛捐杂税，权贵贪官横行，使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不

均，民众饥寒交迫，感受不到人生的尊严和幸福，看不到希望和出路，最后忍无可忍，奋起抗争。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秦末农民大起义时，秦始皇统一中国才不过十余年，到秦二世时“天下苦秦久矣”，始皇帝设想的万世不竭家天下，成了一枕黄粱美梦。司马光说：“治乱之道，古今一贯”“治乱之源，古今同体。”封建王朝统治者竭力探寻维护的“龙脉”，并不在大山大河，而应在亿万民心之中。其基本规律，就是看执政者是否尊重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将统治者分为四个等级，指出最高明的统治者，人民只知道他的存在，丝毫不感觉不到权力机构的影响和逼迫；次一等的统治者，人民尊重称赞他；再次一等的，人民畏惧他的权威和暴力；更次一等的，人民轻视他。春秋时期，诸侯国林立，老子指出的后三类统治者可能同时并存于世。对于其倍加推崇的“太上”之治，则反映了老子理想中的美好愿景：统治者具有诚信信实的品德，人民和政府相安无事。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老子提倡的“太上”理想治理模式，集中反映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然而，这个“无为”绝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更加高明的“有为”，高明到百姓觉察不到执政者和政府的行为，做事情如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样自然，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这是老子提倡的执政者应追求的“道”。这至高境界的“有为”，对执政者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一则典故最能说明这个道理，名医扁鹊曾说，我们三兄弟的医术，大哥最好，二哥差些，我最差。因为我治病于病情十分严重之时，所以名闻天下；我二哥治病于初起之时，名闻乡里；我大哥治病在发作之前，没有名气，但在我们家中被推崇备至。风起于青萍之末，任何一件事情都经历初始、发展到显现的过程，能居安思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主动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才是管理者的至高境界。像老子说的那样：“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治大国若烹小鲜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老子以烹饪“小鲜”喻治国，可谓形象生动，寓意深长。因为烧制一条大鱼并不难，而要做好小鲜这道菜才需要厨艺的精准到位。那么国家究竟该如何治理？老子接着给出答案：“以道莅天下。”而“道法自然”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自然即自然而然，亦可引申为规律。这就是说，老子要执政者遵循烹饪小鱼小虾的技巧和方法来治理国家。“小鲜”的特点是：小、柔、嫩，清理干净费时费力，烹饪过程中需控制火候，调和五味，顺势翻转，不可搅动频繁，否则肉易碎，须要有足够的细心与耐心，这是烹饪的基本章法。具体到治理国家或一个地区，简而言之，就是不安为、不折腾、不急躁。

不安为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如

何把握好规律？就是要搞好调查研究，在了解国情社情、体察民情民意的基础上，科学执政、合理施政。毛泽东曾说过：“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强调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极端重要性。不折腾就是要顺势而为，老子指出：“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是谓微明。”韩非子注解“微明”说：“处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孟子也说过：“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抓住时机，乘势而为，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不急躁就是要循序渐进，许多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抓落实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有足够的耐心和韧劲，最后功到自然成。

老子以俯视苍生的恢弘气度，为后人营造了一片辽阔而温馨的精神家园。《老子》一书中，还有很多关于爱民的经典论述，如“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等等。积极接纳和吸收《老子》博大精深哲学智慧和爱民为民思想，可使我们的人格修养和社会实践，渐臻于理想的境界。



北京将台知多少

□ 郗志群

将台是将帅的指挥台或阅兵台，历史上用来驻兵点将、训练军队。在北京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叫“将台”的地方有六处，其中位于今朝阳区有三处，通州区、昌平区、延庆区各一处。

（一）

有关今朝阳区的三处“将台”，在明人曹学佺的《大明一统名胜志》中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将台有三处，其中通州城正西有两处。一处是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所建，用于驻军。还有一处传说是唐朝大将薛仁贵曾在征讨辽东时修筑。从原文将这两处将台在一起叙述看，它们应该距离不远，林木相连成片，也可以视为一体。另有一处将台位于通州城西北，在通往北京城的东直门的路上，就是历史上传说的慕容偁修的拜将台。这处拜将台与今天的将台乡息息相关，也是目前北京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处叫“将台”的地名。

作为将台乡名最早来源的点将台，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剩一个光秃秃的土包。而今，这个大土堆，也早已平整成耕地了。唯有“十一五”时期建成的将府公园内，另建一座仿古点将台。

“将台”得名于现在将台洼村西火车站附近曾有过的拜将台。这个拜将台曾是东晋十六国时前燕皇帝慕容偁所建，现在早已经消失，而且拜将台所在的将台洼村，也由于行政规划的调整而不属于将台乡，而归东风乡管辖。

将府公园位于朝阳区酒仙桥地区东侧，属北京市绿化隔离地区公园环项目之一，分一期二期。2007年实施的一期工程建设24公顷。将府公园设计充分考虑利用现有林地条件，挖掘将台地区文化底蕴，融入适合在自然环境中开展的休闲、健身、娱乐、体验、科普、观赏等多种活动，提供必要的配套服务设施，满足居民的多种

休闲需求。公园设计总体分为六大功能区，分别为驼房文化休闲区、林地休闲观赏区、将台水景休闲区、坝河水岸观赏区、球类体育运动区、京韵文化活动区。将府公园建设集中体现挖掘将台文化、打造公园品牌、服务地区居民的指导理念，公园主门以一本厚重的线装版将府公园故事书拉开序幕，将游人带往悠悠的历史故事中。

公园建设贯穿挖掘将台文化底蕴的思路，通过酒仙桥的传说大型壁画墙，向游人娓娓讲述了酒仙桥美丽的传说故事；青灰色的点将台悄然引领人们畅想古代帝王登台拜将那悠远宏大的场面；驼房小径、驼影寻踪景点讲述了公园所在，驼房营村地名的由来与坝河昔日粮船穿梭的繁忙景象，公园整体流露着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

将府公园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突出郊野、自然协调的原则，在原有林地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护、利用现有林木资源，按照适地适树、丰富生物多样性的要求，以乡土树种为主，优化林木结构，注重植物的生态配置、季相变化、自然景观和生态功能，为市民提供流连忘返的休闲、健身、娱乐场所，使之成为广大市民宝贵的绿色财富。

（二）

对于通州城以西的将台，历史书上还有不少记述，比如明人李贤《大明一统志》卷一记载：将台，在通州城西25里，本朝中山武宁王徐达建。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左丞相徐达的部队到达通州，在距城30里的地方筑台驻军。第二日天降大雾，在作战中设下埋伏擒住了主要将领。元朝皇帝闻奏报，吓得惊慌失措，连夜从建德门北逃上都。徐达的部队到达大都，攻入齐化门，执其监国帖木儿不花。现在通州西土垠高半里、广方半里的点将台一种说法是当时所筑之台。还有一种说法，此将台是唐薛仁贵征辽

东的驻军台，徐达沿用了这个将台。后来明成祖靖难之役曾来到此地，“南驻蹕焉”。

两段文献中虽然记载的有所不同，但都明确说此处将台是在通州城西，从方位上看肯定离北京城的朝阳门不远。事实上，在其他明朝文献中，说到此处将台就明确记载“在朝阳门外近郊”。由于此地是由徐达筑台驻军，又是明成祖朱棣靖难而南驻蹕处，所以受到明朝政府的格外重视。甚至到了明英宗正统年间，皇帝朱祁镇先派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阅武于将台，并于正统七年（1442年），亲自到将台检阅军队。据明人陈建《皇明通纪法外录》卷19记载：英宗皇帝在将台检阅军队。皇帝命令各大将骑射，每名将士均要连发三箭，以中靶最正、最多者为优胜。接受命令的骑兵有上万人，只有驸马都尉井源弯弓跃马三射三中，万人彩声彻天地。从“受命者万余”可见这次阅兵的规模之大，受到明英宗重视的程度之高。

关于此处将台，《大兴县志》中还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嘉靖年间，京师有道士说他在将台下遇到徐达将军，将“费力法”非常详尽地传给了道士。费力法即现代通称的气功。可见，从明初徐达筑台到明中后期，此处将台一直备受官方和民间的关注。

这三处“将台”（严格地讲应该是两处），其位置分别在老北京城的朝阳门外和东直门外，这个区域在明清时期属于通州、大兴县属地，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无疑是朝阳区的管辖范围。

（三）

查阅明人杨行中编纂的《通州志略》，其中有一幅《通州分治图》，从图上可见明代通州城南门外有一处教场，中间设有将台。

另据《清世宗实录（雍正朝）》卷119记载：直隶各营都没有教场，以便检阅骑射，唯独通州一营无。经过

调查发现，原设教场在城南门外将台，清顺治年间被圈为旗地，遗址仍旧保留。大臣奏请将原教场拨还该营，皇帝考虑到这种做法对于训练军队有好处，便答应了这一请求。这说明此将台曾为清军通州营操练之教场，虽曾废弃，但到雍正年间又被恢复。

《（康熙）延庆州志》记载：教场在州城东北二里，景泰三年守备都指挥杜俊、副千户刘政等创建以操练军士。将台一座，演武亭三间，前敞以轩。景泰三年是公元1452年，可见此处将台建造于明代宗时期，主要职能也是操练军士。《（康熙）昌平州志》则记载：将台，在州治南门外演武场。

通过以上将台介绍，我们可知北京地区历史上的将台可大致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军队教场中的“将台”，主要是供军队日常操练，领军将领登台指挥、阅兵的场所，属于军事日常设施。通州、延庆、昌平的将台应属此类。这类将台位居教场之中，是附属设施，所以不会作为地名出现并且流传。二是历史遗迹类的“将台”，围绕着这些遗迹往往流传有故事，也会涉及一些人。这一类将台由于得到官家的重视和民间百姓的关注，相关的故事也能得到很好的传播，遂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地点，久而久之也就演变成地名。朝阳门外、东直门外的将台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尤其是东直门外的将台，如前所述，它是目前北京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处叫“将台”的地名，其在历史内涵、文化价值、古代地名信息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传统意义和现实意义。

